

書 評

藍 美 華^{*}

Franck Billé

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255 pages. ISBN: 978-0-8248-3982-6

這是一本有學術價值也相當好看的書。作者 Franck Billé 是畢業於劍橋大學的社會人類學家，能夠掌握蒙文、中文與俄文，透過 2006 至 2007 年在田野場域（主要是烏蘭巴托）的參與觀察，利用訪談所得以及公眾論述、媒體、塗鴉、影像、流行歌曲等各類資料，細緻地剖析蒙古的恐中 / 仇中 (sinophobia) 現象，提出令人信服的看法。

除了前言、結論外，全書分為七章。第一章〈謠言、焦慮與暴力〉描寫了蒙古民間流傳的各種對中國人的負面謠言、當地中國人的形象、中國對蒙古的陰謀、反中的蒙古極右派民族主義組織及相關行動等。作者說明，這些負面想法並未呈現為集體的暴力，實質的身體攻擊也很少，主流媒體也不會加以宣傳，並不能代表所有蒙古人的觀點。因此，作者認為「焦慮」(anxiety)

2016 年 7 月 19 日收稿，2016 年 8 月 11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8 月 11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Lan Mei-hu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比「害怕」(fear)更適合描寫蒙古人的這種心理，因為他們認為的威脅實際上是模糊不清。(頁 43) 他的論點是，把「中國」和「威脅」連結在一起，主要是因為蒙古和中國缺乏互動；蘇聯急於控制蒙古，所以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蒙古和中國沒什麼接觸。(頁 42) 中國的龐大人口與經濟實力讓蒙古人擔心自身民族與文化能否持續。作者認為，蒙古人此種妄想的形成，雖然威脅來自於外，但其焦慮的來源則來自於內。(頁 45)

第二章〈恐中與過度〉提到蒙古人的雙重焦慮：一則害怕自己的國家被中國併吞，二則擔心蒙古處於邊緣、不重要的地位。(頁 49) 作者描述，蒙古人對中、俄的印象極為不同；當初選擇與俄國站在一邊雖然原因複雜，不完全是因為討厭或害怕中國，但也顯示了蒙古人對俄國這個他者的正面看法。(頁 51) 相反的，中國代表的卻是反蒙的負面的他者。(頁 49-50) 這種選擇性排外 (selective xenophobia) 的原因在於，蒙古接受代表西方現代性的他者如歐美與俄羅斯，但排斥代表封建、落後、不動的亞洲的他者。蒙古人讚揚其傳統生活文化的單純美好，對於傳統蒙古性 (Mongolianness) 的喪失怪罪於俄國與歐美的影響，卻從未埋怨中國人。作者分析這種矛盾的心理，認為儘管蒙古與中國文化部分同源，但蒙古人試圖否認中國在蒙古身分的形塑上曾有任何影響。(頁 54-55) 蒙古人的恐中也來自於中國的「過度、過量」(excess)：中國人口過多；渴望蒙古土地與蒙古女人的中國男人足以淹沒蒙古；貪得無厭，對錢的興趣從不停止，妄想蒙古的各種資源；太吵，不知自制；想法太拐彎抹角，兩面人，想太多；太愛工作。這些都和蒙古人不一樣，都太過頭了。作者借用克莉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的賤斥 (abjection) 理論分析說，蒙古人自認其現代性必須切除本身具有的過多亞洲性 (Asianness)，他們對中國人的憎恨和象徵性暴力，實際上是對蒙古人本身的一種暴力形式。這種暴力的目的在製造差異、強化差異。(頁 66) 主體必須推開自身來自母體的雜質，才能進入象徵的秩序，才開始出現與表達；蒙古人想與中國人劃清界線，必須先鄙賤對方，然後加以排斥，形成「賤斥的暴力」(violence of abjection)。

接下來的一章〈中國人的幽靈像〉(The Spectral Figure of the Chinese) 旨在探討恐中論述的機制。蒙古人不想和中國人沾上關係，用數不清的方式來區別彼此的不同，認為他們的體型大小、力量、眼睛形狀、髮膚顏色及其他

種種都和中國人有差異。相反的，蒙古人主張自己和俄國人有很多共同點：體力、肌肉發達、能喝酒。對蒙古人而言，俄國人的大鼻子與金髮不代表本質上的不同，但自己和中國人體質上的差異卻代表道德上的不同。（頁 71）作者強調，這種現象是基於蒙中雙方缺乏直接接觸，而非一世紀以來彼此關係充滿困難的結果。（頁 72）蒙古人對中國或中國人的看法帶有「東方主義」色彩，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深深影響了蒙古人。蒙古人喜歡想像自己和俄國人甚至西方人相似：開放、直接、率直。（頁 74-75）筆者也曾親耳聽過蒙古人自認是歐洲人。蒙古人對內蒙人和布里雅特人的態度，則反映了他們對中國和俄國的看法，他們認為內蒙人和中國人一樣，甚至因為漢化、不純而更糟，但對俄國對布里雅特人的文化影響卻視而不見。蒙古人更害怕那些看起來像蒙古人卻混有中國血液的人，因為他們散布在蒙古社會各個階層。（頁 89）族屬血統的純潔和對國族的忠誠是合一的，因此那些混血雜揉而看不見的威脅被認為是最危險的。對蒙古人而言，中國人就像無所不在的幽靈般，雖然有時不明確，但卻影響著蒙古文化的各個面向。作者也表示，蒙古族性是不穩定與游移的，必須在不斷的操演（performativity）中獲得新的意義。（頁 93）透過貶抑中國人來定義什麼是蒙古人就是一種操演。

第四章〈隱喻與內在的緊張〉繼續談及操演、蒙古人該有的規範以及游牧傳統對蒙古人的內化影響。蒙古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學會如何坐、說、站、睡。作者認為，了解蒙古性的核心就在於了解 Marcel Mauss 所說的「身體的技能」（techniques of the body），即身體的動作實際上是文化培育出來的；蒙古人自認他們的身體有其特點，外人看似任意隨便的動作其實具有文化正當性。（頁 96）傳統的蒙古人與自然環境、土地、牲畜關係密切，當今的蒙古人對蒙古性有部分是據此想像而來，就像他們腦中中國人的形象實際上也多非根據實際經驗得來。本章提到蒙古人對孩子身上蒙古斑的誤解，以為這是蒙古人的特徵，不知當初命名者所謂的「蒙古」其實指的是「蒙古利亞人種」（Mongoloid race，亦即黃種人），而且很多中國人出生時也有蒙古斑。他們自認蒙古人就該住在蒙古、呼吸蒙古空氣、吃蒙古食物；一旦不舒服或生病了，回到出生的土地上滾一滾，身體就會好起來。蒙古牲畜記得故鄉，在北京市場上出售的蒙古牛馬，遇見蒙古人時會流淚；蒙古狼對外國人構成危險，但對蒙古人卻不會，因為蒙古人不會露出害怕的神情，而外國人則嚇得逃跑。

總之，蒙古人具有男子氣概，是勇敢、強壯、有耐力的。作為蒙古人，會說蒙古話是很重要的，而外國人（主要指中國人）即使蒙古話說得再流利，等年紀老了、喝醉或無法自制時，就會露出原來的口音。儘管現在的蒙古人多居住在城裡，很多人已經失去傳統的知識，但仍自認是「馬背上的民族」，藉由游牧傳統和草原生活來定義蒙古性。城裡的蒙古人對鄉下有種矛盾感，覺得它代表真正的蒙古，但也是骯髒、沒文化的；去了幾天鄉下，回到城裡反而覺得放鬆。蒙古人一方面擁抱都會性、國際性以及俄國人帶來的現代歐洲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又想維持獨特、與自然共生的傳統文化。作者借用精神分析大師拉岡（Jacques Lacan）的概念指出，把蒙古人與俄國人區別，也與中國人或其他亞洲人區別，游牧正是這兩個取向的縫合點（quilting point），把現代性的正面連結到看不到正面的更深沉的傳統。（頁 119-120）透過游牧這個縫合點，讓滑動、不穩定的意義固定下來。

第五章〈身體的革命〉主要在論述社會主義時期俄國對蒙古人思想的影響，以及蒙古在建築、衛生、教育、習俗、醫療、性別角色各方面的現代化。這些都是在 1921 年蒙古獨立後從俄國引進的，俄國代表了歐洲與現代性的理念，而蒙古脫離的中國則代表了亞洲。俄國和西歐相較起來較落後，願意大力發展蒙古成為現代化國家，也是俄國證明自身有能力將歐洲文明帶給其他落後國家的一種心理的反射。（頁 125-126）社會主義的蒙古和革命前的蒙古有了極大的改變。不過，本章所說的革命既指涉社會主義時期的劇烈改變，也指涉後社會主義時期試圖回歸革命前傳統的實踐方式。（頁 123）民主化之後，民族主義強烈的蒙古顛覆了情感上對俄國的依附與認同，強化蒙古國族的重要性，並且集體自戀地將蒙古描繪成對中國充滿誘惑的餌。（頁 129）蒙古重新擁抱傳統，對風水、素食與宇宙能量等亞洲事物也充滿興趣，但社會主義時期重歐輕亞的心態依舊存在，所以蒙古人喜歡上述事物並不是因為與中國或亞洲文化有更緊的連結，而是透過俄國或美國的新世紀（New Age）書籍接觸而來；而對傳統的擁抱也不僅是重新發現已遺忘的過去，而是對傳統蒙古文化的一種現代應用。（頁 148）作者指出，蒙古在歐亞光譜中位置的不穩定，以及從中國人的模樣中看見自己所造成的張力，引發了反中的焦慮與語言暴力。（頁 150）

後續的第六章〈共同體與操演〉（*Communitas and Performativity*）是各章

中最短的，描述恐中、仇中是蒙古人建立共同體的方式之一，以及蒙古人內在的暴力。蒙古人認為反中是存在其血液中的，作為蒙古人和憎恨中國人是同一件事，但作者提醒說，蒙古人反中的言論必須從表演的角度來理解，因為它往往無法提供新的訊息，只是加強彼此共有的對中國人的假設與刻板印象；如同儀式一般，脈絡與重複比實際所說的內容更重要。（頁 155）蒙古人的現代認同就是要與中國全然分離，因此反中的情緒被用以激發社會的團結與群體的驕傲，試圖建立共同體的感覺。（頁 154-155）抵抗中國在政治與文化上的侵犯使得蒙古性得以標準化，不僅可以避免外在的分歧，也可避免內在的分歧。恐中、仇中可以作為工具，在集體利益的概念下凝聚群體，用以訓練蒙古社會體。（頁 157）事實上，對中國人直接噏聲或是公開表達反中情緒是不多的，而且很多在蒙古的中國人不懂蒙古話或蒙文，甚至不知道蒙古人對中國人或中國的負面看法，牆上蒙文的反中塗鴉，多半是給蒙古人看的。（頁 160-161）這些都是一種表演或操演。

雖然蒙古恐中、仇中的情緒看起來相當普遍，但在第七章〈在邊緣的身體〉，作者卻以婦女與男同性戀者的例子指出，並不是所有蒙古人都反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認同蒙古社會強調男性特質的想法。在社會主義時期，蒙古婦女象徵現代性，接受新式教育，平等參與各種職業，被視為社會轉型走向共產主義的關鍵。民主化之後，婦女在蒙古教育與專業市場的參與比例明顯超過其在人口中所佔比例；失業、貧窮等社會問題以及丈夫酗酒與家暴導致婚姻破裂，使得很多婦女必須肩負起全家的家計責任。（頁 165）儘管蒙古婦女是自由的，但社會對她們的假設依舊相當傳統：渴望結婚、生小孩、工作協助負擔家計；若不遵守這些規範，就被看成是自私、失敗的女人。（頁 165-166）除了現代性外，蒙古婦女也象徵傳統，她們生養兒女，是文化與民族延續最重要的傳遞者；因此，她們對婚姻或性伴侶的選擇就被賦予政治意涵。（頁 167）事實上，許多蒙古婦女認為蒙古男人不認真工作、愛喝酒，社會上對蒙古女性的要求不合理，有些的確希望嫁給外國人並移民國外，而歐美男性是她們的優先選擇。（頁 174）蒙古男人認為，蒙古女人和中國男人在一起，完全只是為了金錢，毫無愛與情感可言；蒙古女人需要他們的保護。但作者訪談了多位蒙古性工作者，她們對中國客人普遍有好印象，認為他們斯文、有禮貌、友善、有同情心、慷慨、心地好，比起其他俄國或西方的客人來得

好，而她們最需要小心的反而是蒙古民族主義分子。（頁 176-177）至於男同性戀者，他們在蒙古是弱勢，強大的社會壓力讓他們不敢表露自己的身分，烏蘭巴托也沒有同志酒吧之類的場所。因此，他們許多都屬於沉默的違逆者或異議分子，希望離開蒙古，躲開家人與鄰居窺探的眼光；而中國對他們而言是有吸引力的，因為那裡有人多的城市、同志活動場域以及數不清的機會。看起來好像蒙古婦女與男同性戀者是屬於政治弱勢，不太有機會發聲來定義一個蒙古公民該是什麼樣貌，而喊得最大聲的是那些多由失業青年組成的極右派民族主義團體。但作者指出，蒙古婦女在高等教育與商業部門所占比例較高，這些想要強化傳統規範的極右派民族主義分子所使用的抽象或實際的暴力，其實正顯現了本身的無力。蒙古男同性戀者通常教育程度較高、較常旅行、較具都會性，會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判斷，不會毫無批判性地接受媒體的說法。（頁 190）因此，他們相對來說比較不排除或反中。

在結論中，作者重複其觀點，認為蒙古在後社會主義時期所顯現的恐中、仇中情緒是來自於之前雙方長期的隔絕，導致蒙古對中國嚴重缺乏理解。加上社會主義時期與俄國關係密切，俄國對蒙古描繪的中國都是負面的；中國是邪惡的，絞盡腦汁要侵略與併吞蒙古，如果沒有俄國的協助，蒙古早就是中國的了。這些都大大影響了蒙古人對中國或中國人的看法，甚至在 1990 年之後，即使中國提供蒙古援助或長期低利貸款，都被看成是一種長期的政治算計，而來自俄國或歐盟的就是善意的援助。（頁 195）不過，作者表示，堅決反中的往往是貧窮、中國經驗有限的蒙古人，而旅行經驗多、去過上海、新加坡這類地方的蒙古人較少發表反中的評論。此外，只要現代性還與西方連在一起，蒙古性就必須與亞洲切斷文化上的連結。（頁 193）作者還提醒，若把蒙古女性都想成是受到蒙古男人的壓迫是太簡化了，許多蒙古女人聲稱喜歡有自信、強壯、肌肉發達的男人。最後，作者認為，儘管蒙古人自稱與西方人有許多相似處，但很多蒙古文化特色是東方的，如尊重老人、以親族為中心的人際網絡等。（頁 197-198）如果蒙古的存在有賴於與中國的切割，那也就同時依賴著中國持續的存在，因為沒有敵人就沒有了自己。

在筆者的經驗中，反中現象的確存在於蒙古，個人親眼看過反中塗鴉，經歷過臺灣男學生被誤認是中國大陸來的而在街上遭到攻擊的事件。作者透過田野調查與研究，深入地探討在蒙古恐中、仇中的現象與背後的原因，本

書出版得正是時候，除學術研究外，也有實際參考的價值。作者除了人類學相關理論外，廣泛運用了拉岡學派的精神分析理論，（頁 8）來解釋蒙古人這種渴望脫亞入歐、賤斥中國人或其他亞洲人的心理。反中實際上是為了定義自己，為了擺脫蒙古人本身自認落後的亞洲性，期待擁抱現代性，讓蒙古得以和西方發達國家連結在一起。蒙古人這種重歐輕亞的觀念與歐高亞低的迷思，一方面反映出對自身民族的驕傲與期盼，但也反映了對於認同的焦慮以及自信心的不足。在民主化、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看待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係、現代與傳統的連結、社會內部意見的分歧以及認識相關國家與人群的真實面貌，是每個蒙古人必須面對的挑戰。

本書是一個跨領域的研究成果，在蒙古研究、人類學、族群認同、民族主義、現代性與暴力研究方面，都有其貢獻。作者對蒙古反中現象的解釋雖然簡單，但筆者同意蒙中雙方之前長期對立、缺少接觸與理解是最重要的原因。雖然此書讀起來有趣，但不能否認，或許因為捨不得割捨，有時不免有點雜亂的感覺。再者，除了引用過一位內蒙人的看法，提及在蒙古的中國人很多不懂蒙古話與蒙文，以致不太理解蒙古反中的情緒外，沒能呈現那些理解反中行爲的中國人的看法，有點可惜。此外，書中也有些說法不夠精確，例如作者提到從 1930 年代晚期到 1990 年蒙中雙方實質上沒有接觸，（頁 193）但在中蘇共關係尚稱友好的 1950 年代，中共積極拉攏蒙古，雙方關係其實相當友善，互動也頗密切。

本書封面中留著長辮、穿著清代官服、微微暴牙、露出貪婪狡詐神情的圖像，代表了偏執的蒙古反中論述中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與真實的中國人差距甚遠。今日的蒙古在政治、經貿、文化各方面都與中國互動密切，中國是蒙古最大的貿易夥伴，蒙古近九成的出口是到中國，三成以上的進口也來自中國。隨著中國國際地位與影響力的提升，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對蒙古是必要的，而一向務實的蒙古政府也不可能改變此一作法。至於蒙古社會對中國印象的改善，則有賴於雙方更多的互動與理解。只有透過政府與民間的努力，誠意互動，建立彼此的信任，一個友好共善的關係才會出現，而這是值得期待的。

